



茅盾文学奖获奖者散文丛书

李国文 著

历史的真相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www.jscbs.com

历史的真相

茅盾文学奖获奖者散文丛书
李国文 著

何言宏
赵云华

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的真相/ 李国文著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1

（茅盾文学奖获奖者散文丛书）

ISBN 978-7-5399-3504-1

I .历… II .李… III.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08985 号

书 名 历史的真相

著 者 李国文

责任编辑 汪修荣

责任校对 王一冰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652×960 毫米 1/16

字 数 240 千

印 张 18.75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3504-1

定 价 28.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辑 大雅村言

- 003 皇帝与作家
- 010 刘项原来不读书
- 017 闲话建安七子
- 028 朱皇帝的残忍
- 037 义和拳百年祭

第二辑 中国文人

- 047 何物老嫗生宁馨儿？
- 055 草间偷活沉吟不断
- 064 挺然为之张居正
- 076 升沉不过一秋风
- 084 司马迁之死
- 093 稷中散之死

103	李后主之死
113	方孝孺之死

第三辑 唐朝的天空

125	唐朝的天空
134	曾经沧海难为水
144	人间惟有杜司勋
154	仰天大笑出门去
168	中国御用文人的末路
182	中国文学离完蛋还有多远？
192	中国帝王的聪昏周期率

第四辑 走近苏东坡

205	大江东去
214	走近苏东坡
224	大师的风范
233	苏东坡与王安石
245	苏东坡的最后流放

第五辑 楼外说红楼

259	曹雪芹写性
265	秦可卿的魅力
272	天下第一老太
282	王夫人的精明
289	茗烟的奴才学

第一辑 大雅村言

皇帝与作家

刘项原来不读书

闲话建安七子

朱皇帝的残忍

义和拳百年祭



皇帝与作家

这是一个很不搭界的话题，作家者何？按照王渔洋的话说，“乃一酸丁也”而已。这话说得多少有点损，但在皇帝眼里的作家，也确实就是这副酸不溜丢的“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的模样，大概比孔乙己好不到哪里去。

在中国历史上，有些风流儒雅的皇帝，或相当于皇帝这样的最高执政者，身边总是有一些作家陪着的。哪怕粗通文墨，或者狗屁不通，既然贵为天子，没有学问，没有文才，怎么行呢？驾幸好山好景，不题两句歪诗，逢年过节，不写两笔孬字，作墨宝赐给臣下，哪还叫什么九五之尊呢？连慈禧太后，还从云南找来一位姓缪的贵妇，教她书法，替她写字呢！

这些被雇用的文人雅士，身份高的，年纪大的，叫作“庭筵讲授”，例如朱元璋的宋濂。通常是先请吃饭，然后，沏上茶再来讲文学；朱元璋的后代朱翊钧，就在这庭筵上发表过高论：“贞观之治有什么了不起？不足道也！”令在座的那几位庭讲的翰林院学士吓一跳，因为这个后来躺在定陵里的皇帝，实在是很不怎么样的统治者，明朝就是从他神宗时代开始走向衰败的，不是一个地道的昏君，也是一个无能的庸主。他认为：“李世民杀弟欺父，算什么英主？”当场的御用文人们，只得连连称是。“陛下英明高见，佩服佩服！”至于那些身份一般，年岁不大，就叫“侍读学士”，例如武则天的上官婉儿，那就算是随叫随到的身边工作人员了。这恐怕是讲完了文学，再行赐饭，顶多御厨房里添两份小炒，那就皇恩浩荡了。

一个作家能够被召侍奉皇帝，应该说是一份美差。不管你愿意不

愿意，点到你的名，是看得起你，你还不要不识抬举。老实说，也没有一个作家，敢不识相予以拒绝。东汉末年，董卓擅国，他也像皇帝一样地作威作福起来。为了粉饰暴政的门面，想起了当时的一级作家蔡邕，他就下令要这位老先生到洛阳来做官。蔡邕正是怕给这个废帝弑后的军阀当差，才逃跑的。董卓放出话来：“我这个人是好杀人的，如果蔡先生不来洛阳，和我谈谈文学，对不起，我不仅杀他，还要灭族！”蔡邕摸了摸自己的脖子，与其被他砍头，还不如和他聊聊文学新概念或者什么后现代主义呢！

于是，他屁颠屁颠地坐着牛车奔赴洛阳报到，半年之内，被董卓连着提拔三次，官做得很大，位至三公。所以，侍候皇上，是一份俸禄很高，赏赐很多，地位很高的差使，而且也是一份责任很小，工作很少，负担很轻的差使。因为皇帝日理万机之余，大部分时间是要去同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厮混，不可能腾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和这些作家谈诗词歌赋、文章典籍。封建社会里好多作家，包括大作家，也很想蒙受这份帝王的青睐。那个“吹皱一池春水”的冯延巳，给南唐的中主李璟捧哏逗闷，那是快活一生，得意一世的，被称作风流君臣。

因此，封建社会里一些知识分子，就把这些皇上身边的作家，叫作“御用文人”，看不大起的。这里面，有属于正直的蔑视，有属于清高的自负，也有的是属于眼红的嫉妒。作家嘛，十之八九，圣人也难例外，都程度不同地喜欢呷醋吃味的。这就是吃不着葡萄的狐狸，便要说葡萄酸了的假惺惺了。这后一种作家，认为自己比那班御用文人，文才要高，学问要大，资格要老，声望要好，只有他才应该被恭请到京城，一顶青衣小轿，从东华门抬进，直到乾清宫御书房坐下来，与皇帝指点文学，挥斥作家。可是这座位由别人坐了，只好作东篱种菊、悠然南山状了。御用文人由于太靠近皇帝的缘故，容易得到别的作家难以得到的那些荣誉声名，权势金钱。因此，得不到的作家于是乎很生气，或者生闷气。“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自恋自虐之余，抽不冷子金刚怒目，也是应该能够理解的。

御用文人不招人待见的方面，也是令同行颇为齿冷的，就是他有机会在皇帝耳边嚼舌头根，或者参奏哪位作家一本，或者密报作家可疑动向之类，深文周纳，是叫人吃不了兜着走的。清代很多文人“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一道查抄圣旨下，合家合户充军发配，罚往乌苏里台给披甲人为奴，都是这些御用文人，给皇帝举报的结果。因为要在字里行间挑起毛病来，同行最是行家里手。

宋代的苏东坡，这位大师由于反对新政，被挤出了京城，一度在湖州做地方官。但那些围在皇帝身边的三四流文人，仍不肯放过他，鸡蛋里挑骨头，还在找碴。这也是小文人被大师压得喘不过气来时的逆反心态。一旦文学上无力一较长短，就依靠政治优势来收拾对手。而最厉害的栽赃诬陷，莫过于告他反皇帝了，那可是置人于死地的绝招。由于苏东坡的一首咏老柏的七律“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一帮人串起来告到皇帝那里，硬诬他是在诋毁宋神宗。此类手法虽然笨拙，但却从古至今，盛行不衰。尽管呆傻儿当皇帝者不少，不过这位皇帝还不算十分白痴，他还能和那些御用文人辩争：“苏轼写的是古柏，与朕何干？”有一个叫王珪的老文人兼近臣，叩头撞阶，说：“龙即陛下，陛下即龙，这种心怀歹毒的形容是大不敬的呀！”于是一封诏书，将东坡先生从湖州递解回开封，关进大狱。然后组织专案班子，把这位大师的作品，一一过筛。文人整文人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往政治上拉，上纲上线，无所不用其极，这时候倒一点不讲文学规律了。

话说回来，太接近皇帝的文人，也并不太值得羡慕。好处固然很多，但风险也很大。《韩非子·说难》里提到：“夫龙之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若人有婴之者，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玩龙，或陪龙玩，倒很像马戏团的驯兽师，不知什么时候，老虎狮子兽性大发，咬你一口，抓你一把，不死也得掉层皮那样。皇帝老子高兴起来，和你唱和一首，填词两阙；要一翻脸，轻则卷铺盖，重则掉脑袋，在史书上也是屡见不鲜的。

《史记·郦生陆贾列传》提到陆贾这位文化人和刘邦的争论。因

为他“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刘邦这番话颇具有工农洒脱率直的本色，“老子就是大老粗，你怎么着？”不过，他是中国历代皇帝中最早一位写诗的人，有点文学灵气，他的“大风起兮云飞扬，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应该说是豪放一派的。比之他的敌手项羽的“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那种悲观色彩，确乎不同，有大家风范。所以，他只是恼火骂两句，也就罢了。顶多撒起野来，拿儒生的帽子当夜壶用，故意往里面小便，仅此而已。

可流氓无产者朱元璋，就没这便宜了。这个当过小和尚，当过要饭花子，当过兵贼的皇帝，出身成分自是呱呱叫的好，但他对于文化人的阶级拒绝心理，严重失衡，接近变态，成了一个疑虑成性、狂虐嗜杀的暴君。哪怕是在拍他马屁的文章中，有可能联想到他当和尚、当兵痞者的同音字，也会马上推出午门斩首的。中国封建社会里，最残忍的刑法之一，就是将犯人的皮，整张剥下来塞上草，所谓“剥皮揎草”，他是最爱采用的。所以给他当御用文人，下场好者不多。甚至他儿子的老师，他的五经师，可称为他的第一御用文人宋濂，差点也被他砍了脑袋。

据明徐祯卿《翦胜野闻》载：“洪武十年，宋学士濂，乞老归。帝亲饯之。敕其孙慎辅行。濂顿首辞，且要曰：‘臣性命未毕蓬土，请岁覲陛阶。’既归，每就帝庆称贺如约。帝念旧，恋恋多情深。十三年，失朝，帝召其子中书舍人璲、孙殿廷礼仪司序班慎，问之，对曰：‘不幸有旦夕之忧，惟陛下哀矜其罪！’帝微使人瞰之，无恙，大怒，下璲、慎狱，诏御史，就诛濂，没其家。”

这就是潜溪先生的不是了，作为朱元璋的文学顾问，已经获得了“开国第一文臣”的荣誉，声名地位也到了顶尖的地步，决定“乞老归”了，那就彻底归吧，可他却是个不甘寂寞的老作家，想归又不想全归，要求每年来觐见一次皇上，似是忠诚，实是邀宠。其实朱元璋设宴饯行，本是让他一走了之，不再需要之意，可此公老不知趣，就是十分的

无聊了。大概见了两次，也没有什么油水可捞，便要奸脱滑不去了。他忘记一个真理，凡流氓，是特别忌讳别人对他耍流氓手段的，朱元璋本是一个流氓无产者，来这一套，他会买账？这位皇帝的特务系统，密如蛛网，连小巷酒肆里议论他老婆脚大的小市民，都被捉将官去治罪，何况老先生没病装病，连病假条也拿不出来。幸好太子出现，皇后求情，宋濂的命算保住了，但谪居茂州，终于死在半路上。他儿子宋璲、孙子宋慎，到底还是让朱元璋给杀了。

御用文人下场之惨者，莫过于此了。

清朝一位编过《唐诗别裁》、《古诗源》的沈德潜老先生，直到乾隆七年，他六十七岁时，才发达起来，老骥伏枥，晚年生辉，这恐怕是很令一些怀才不遇的老龄作家心向往之的事情。“高宗莅视，问孰为德潜者，称以‘江南老名士’，授编修。出御制诗令赓和，称旨”，从此成为乾隆的御用文人，恩遇有加。“八年，即擢中允，五迁内阁学士。乞假还葬，命不必开缺。德潜入辞……赋诗饯之。十二年，命在上书房行走……是岁，上谕众臣曰：‘沈德潜诚实谨厚，且怜其晚遇，是以稠叠加恩，以励老成积学之士……’”（《清史稿》）

做御用文人除了随班唱和，歌功颂德，吾皇万岁万万岁外，一个必须严格自律的准则，就是只能有皇上的看法，万不可以有自己的观点。政见不可有异，要跟上形势，在文学观点上，也必须和皇上保持高度一致的。这位老先生由于圣眷恩渥，众望所归，在文坛上也是一言九鼎的领袖群伦的人物，于是多少有点忘乎所以，因此使老作家栽了个大跟头。他编了一部《国朝诗别裁集》，乾隆一看，火冒三丈，因为在这部书里，沈德潜居然选了钱谦益的诗，乾隆说：“那是个明朝降臣，怎么能放在一书的最前面呢？而且还选了钱名世的诗，那就更荒唐了，那是皇考雍正定性的‘名教罪人’呀！”老了老了，自以为不逾不惑，其实却是感觉错位的老糊涂，碰了这一鼻子灰，惶恐万分。不过还算走运，乾隆高抬贵手，放了他一马。

但没有想到，他死后不久，“四十三年，东台县民讦举人徐述夔《一

柱楼集》有悖逆语，上览集前有德潜所为传，称其品行文章皆可为法，上不怿，下大学士九卿议，夺德潜赠官，罢祠削谥，仆其墓碑。”（《清史稿》）死了，恼了皇上，也不饶的。如果沈德潜编选这部集子，把乾隆的诗选上大半本，而且放在开卷部分，也许这份检举揭发材料里，有他的名字，也会从宽发落，不会把老先生的墓碑也给铲平的了。所以，御用文人活着时，要察言观色，小心侍候，死后，还得战战兢兢，惶恐九泉，因为不知什么时候，龙颜大怒，就要鞭尸戮骨的。

总的来说，御用文人在封建社会里，尽管吃香喝辣，但充其量只是起个陪衬点缀，歌舞升平的作用。赏一个官当当，领一份干饷，放一任学差，到外省去捞一票，就算皇恩浩荡了。也就如此，前面提到的宋濂、沈德潜，明清两代最顶呱呱的御用文人了，又如何呢？太史公司马迁早看透了，文化人，皇帝的玩物，饭桌上一碟开胃小菜而已。想吃，夹一筷子；不想吃，推到一边；不高兴，扔进了泔水桶当垃圾处理，不怎么当回事的。他在《报任安书》里这样评述自己：“仆之先，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

尽管中国的皇帝，喜欢搞一种文字狱的游戏，动不动把作家的脑袋砍下来，对作家应该是颇不感兴趣才对。但也许我们中国终究是文化古国的缘故，皇帝自己舞文弄墨想做作家，或挤进作家队伍者，倒也不在少数，这真是一种奇特的文化现象。一方面整作家，杀作家，收拾作家不遗余力；一方面在皇冠外，再弄一顶作家的桂冠，戴在自己头上。因此极少有以文盲自诩的统治者，当然也不是没有。前面提到的汉高祖，一开始很以“马上公”为傲的，后来，叔孙通给他演习礼仪，他也体会到皇帝的威严，从此尊儒。随后，这位亭长衣锦还乡，不也写开诗了吗！一当上皇帝，好像才气也跟着蓬勃，艺术细胞也来得丰富了。他的诗《大风歌》也许会被御用评论家喝彩，把他划入豪放派诗人一族中去。如果当时成立汉朝作家协会的话，那么第一号会员证，则非他莫属了。

曹操也是一个杀过作家的统治者，孔融是他下令杀掉的，杨修死在他的刀下，崔琰也不能逃脱一份死罪，连受刑时不屈服的神态，曹操都恨之入骨。那位新锐作家祢衡虽不是他杀的，但也因为得罪了他而送给别人去砍了头。但他自己却是历代皇帝中最称得上是作家的作家，他的才分要远远高于他所杀掉的几位，那些人的作品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他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惟有杜康”来得家喻户晓。但他终究还是有些诗人气质，譬如花钱把女诗人蔡文姬，从匈奴单于手里赎回来；譬如诗人王粲劝刘琮降操有功，褒赏有加；譬如诗人陈琳为袁绍讨操写过批判文章，他捉住了也未杀头，还给了一个书记官当。所以，他这些对待作家的严厉或宽容的举止，只是个人行为。而明清两代以文化人为残害目标的文字狱，则纯属彻头彻尾的暴政了。

这些最爱搞文字狱的皇帝，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极无文化者，如小和尚兼无赖出身的朱元璋；一种是极有文化的，如一生写诗，总量超过《全唐诗》总和的乾隆。这好像也是个规律，若是个无文化的皇帝，对于文化和文化人，存有一种先天的排斥拒绝心理。若曾是个不第秀才出身的皇帝，必然有对文化和文化人的疯狂报复情结作祟。若是个有文化的皇帝，也会产生一种对于文化和文化人的历史疑虑。这就是曹操的儿子曹丕，中国第一位皇帝文学理论家，给后来做皇帝的人提醒的了。

他在《典论》里提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他这么一说，一个做皇帝的，还不知道该怎么样对待作家吗？因此，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作家的命运如何，御用也罢，非御用也罢，大致是可想而知的了。

刘项原来不读书

后代人议论起秦始皇来，第一个话题，就是他的暴政，他的焚书坑儒，多半想不到他作为千古一帝的辉煌业绩。其实，焚书，是始皇帝三十三年的事；坑儒，是始皇帝三十五年的事。将四百六十多名儒生坑于咸阳，是嬴政下令干的，因为他发现自己上当受骗，气急败坏，便对知识分子大开杀戒。但焚书，却是李斯给他出的主意，若要分清罪责，至少在焚书这件事上，秦始皇够不上主谋。

1933年，鲁迅先生于《申报·自由谈》上，写过一篇《华德焚书异同论》。因为当时，德国的希特勒上台执政，实行法西斯文化专制政策，纳粹分子焚烧书籍，禁止所谓“非德意志”（即不符合纳粹思想）的书籍出版和流通，弄得柏林、莱比锡等城市乌烟瘴气，一塌糊涂。所以，一些报章就把希特勒与秦始皇相提并论，鲁迅先生觉得这样比法，“实在冤枉得很”，他认为，秦始皇“吃亏是在二世就亡，一班帮闲们都替新主子去讲他的坏话了”。

这场焚书的无妄之灾，先是几位博士的闹腾，后是李斯的出谋划策，秦始皇才画圈的。

秦代的博士，都是大儒，不同于现在的博士，只是某一专业达到一定水准的学位标志。如今的博士多如牛毛，那时的博士全国才几十位，所以，地位非常之高，政府对他们相当礼遇。始皇帝过生日，特地在咸阳宫置酒，专请博士们赴他的寿宴。显然，嬴政很愿意听这些有学问的博士，唱一曲《Happy Birthday To You》，然后吹蜡烛，切蛋糕。

这就是中国特色了。在历史上，所有朝代的皇帝，打心底里不待见知识分子，他们宁肯要愚民，因为愚民好统治，知识分子有头脑，好

思考,就比较难管理。但有时候,像蛋糕上必须有几粒红樱桃点缀那样,少了装点门面的知识分子还不成,这就是秦始皇一定要请博士们来喝寿酒的隐衷。这本应该是个愉快的集会,想不到,却酿成焚书的悲剧。一怪那个山东老学究淳于越,二怪那个投机分子李斯。

历代文字狱,皇帝固然是罪魁祸首,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倘若没有想借帝王之手,屠灭同类,出坏主意,打小报告的小人,这台戏根本就唱不起来的。李斯在秦国,是外来户,一些人(自然也包括这些博士),一直想把他轰走,他很恼火,耿耿于怀,所以,憋着劲要收拾他们,何况,他是地道的小人。这样说,也许有些过分,但从他最后与赵高沆瀣一气来看,至少,说不上是君子。

其实,吃完甜点,果盘也端来了,博士们就该一抹嘴,抬腿走路。但知识分子中的文化人,如作家,如诗人,在灵魂里都会有不那么肯安生的习性,由此就产生出一种强烈的表现欲。我原先以为“人来疯”是儿童多动症的表现,长大以后,就不药而愈的。后来,我渐渐品出来,有的人,这种“人来疯”的毛病,到了年纪一把,胡子一把,说话泄气漏风,走路跟头把式的老先生,也会像老儿童一样,到了人多的场合,按捺不住要表演,使大家注意他。否则,将老人家旁落于镜头之外,焦距没有对准他,会五急六受,十分痛苦的。

这就是文化人与生俱来的弱点了,从这些秦代的博士起,一直到清代康雍乾嘉文字狱的当事人,常有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非要有这种没事挑事的嗜好,生怕人家把他当哑巴卖了。譬如,说些帝王不中听的话啦,做些领袖皱眉头的事啦,与领导唱一唱对台戏啦,故意不买上峰的账拿一把啦,等等等等,自以为得意。结果呢,往往是请得了神,送不了神,鸡蛋碰到石头上,惹恼了官家,弄不好,就有可能付出头颅为代价。真到了那时,又磕头如捣蒜地求饶,上陈情表,写悔过书,深刻检查,认真忏悔,就不禁令人为之叹息,阁下,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那是公元前 213 年,咸阳宫外,小轿车停了一串,共有七十位博士

被接来给陛下贺寿。博士跪在下面，嬴政坐在上面，主持团拜会的仆射周青臣，自然要讲一通颂扬的话。“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日月所照，莫不宾服。”这也是人情之常，顺水推舟，谁过生日，愿意人家没头没脑浇一盆洗脚水吗？博士淳于越在这场合跳出来，指责人家拍马屁，实在是既没有眼力，也没有什么道理。如按贾谊《过秦论》里描绘的，“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以鞭笞天下”的祖龙神威，周青臣的赞颂，虽有谀词之嫌，但说的也是实话。

现在很难了解淳于越一定要发这次难，所为何来了。是学问太多了的呆气，还是四六不懂的迂腐？是跪得腿疼，心火上升，还是蛋糕块小，嫌分得不公平？依我忖度，很可能是文化人的耐不住寂寞，受不了冷遇的天性所致，文人的出风头欲望，有时候是控制不住的。他之这样做，而且用故意唱反调的办法，完全是希望引起始皇帝的注意。他跪着趋前一步，发了一通“事不师古，而能长久”哉的今不如昔的感慨，然后话锋一转：“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这意思，谁都听得出来，他才是顶呱呱的诤臣。

我很佩服秦始皇的雅量，对这位山东老夫子的指责，并未火冒三丈，而是“下其议”，让大家讨论，够风度。坏就坏在李斯身上，提出了焚书的主意。所以，严格来说，焚书的发明权，应该属于李斯，而不是秦始皇。

不过，李斯立论的基点，师今而不师古，是绝对正确的。他的名言“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很具辩证法，很符合时代发展的逻辑。生活不会停滞不前，它要发展，它要向前，不可能永远生活在前人的阴影里。无论那是一个多么伟大，多么辉煌，在历史上留过多么了不起英名的大人物，过去的，也就过去了。若是后来者，仍旧抱着棺材板不放，说相同的话，做不变的事，走一模一样的路，连放屁也是一式的气味，那就只能是一代没出息的腐儒而已，而腐儒是绝成不了气候的。

但他出的焚书这一招，实在够糟、够恶、够讨厌，谬种流传，贻患无穷，不但希特勒学得很是地道，一直到二十世纪的六七十年代，红卫兵